余华小说中的鲁迅因子

王吉鹏, 吉 瑞

(辽宁师范大学 研究生院, 辽宁 大连 116029)

摘要:余华被不少人认为是“跟鲁迅走得最近的人。”从余华的小说中探寻鲁迅因子,探寻余华在文化精神和创作上对鲁迅的继承。余华在对弱势群体中的农民、知识分子、妇女、儿童的生存状态的极大关注上,在“批判国民性”和“反思历史”的两大启蒙文学主题上,都体现出对鲁迅精神的继承。

关键词:余华;鲁迅;因子;启蒙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5092(2008)02-0035-04

我国的文学思潮在 20 世纪 80 年代处于十分活跃、迅速转换的时期。新一代的作家面临着独特的文化处境,他们面对知青群体是历史的晚生代;面对大师们有着无法摆脱的艺术上的迟后感;面对传统陷入颓败,时代的文化处境以及文学自身发展变革的规律让欲在中国文坛上获得一席之地的新一代作家不得不去寻找一个新的突破口,先锋作家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他们给中国当时的文坛从审美到人生观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也给中国文学史注入了新的血液。余华作为先锋作家中的一员大将,用他独有的冷酷而又不失温情的目光注视关注着现实世界。在他《十八岁出门远行》这篇作品问世时,便引起了许多作家和批评家的关注。“不少人认为,在当代作家中,余华是跟鲁迅走得最近的人。”^[1]¹³³余华也说过:“我觉得在我内心深处和鲁迅非常的接近。”^[1]¹³²余华的创作是在自觉不自觉地向鲁迅靠近,无论是对生活在底层民众的关注,还是对文化、历史、现实的思考,都可以看到与鲁迅相通的地方,余华在坚持自己创作理想的同时,在延伸着“五四”以来的启蒙精神,进行逼视灵魂的国民性批判,又对社会主体的生存进行寓言式的解构,体现着鲁迅精神因子在余华身上的承传。

对底层民众的描写已经成为众多作家所乐此不疲的表现对象,底层民众以及他们的生活不仅成为作家们洞悉社会的窗口,也体现了一个作家的创作姿态。鲁迅和余华都是以立足底层民众叙事立场的创作姿态走上文坛的作家,他们在精神上与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小人物、劳苦大众有着割舍不断的血肉联系,彰显出两位作家强烈的平民意识。他们以犀利的笔触刻画底层民众的“众生相”,通过对“沉默的大多数”即弱势群体中农民、知识分子、妇女、儿童的生存状态的真实描摹和关注,给予作家对底层民众生存困境与苦难存在的深切关怀。

首先,对农民和知识分子的关注。鲁迅的一生都在为“民”请命。一生都在为“沉默的大多数”呐喊。他将深邃的目光深锁于生活在底层的小人物身上。“在儿童时代就混进野孩子的群里,,呼吸着小百姓的空气”^[2]。“我母亲的母家是农村,使我能间或和许多孩子农民相亲近,逐渐知道他们是毕生受着压迫,很多苦痛的”^[3]。于是,他小说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不幸的人们,意思是在揭出痛苦,引起疗救的注意。基于这样的情感和观念,在鲁迅的小说中反映农民生活的题

收稿日期:2007-02-26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十五”规划第一批研究项目《鲁迅与中国文学比较研究》,项目批准号:01JA750.11-44031。

作者简介:王吉鹏(1944-),江苏东台人,辽宁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鲁迅研究。

材占了相当大的比重。《故乡》中的闰土，在多于、饥荒、苛税、兵匪等各种煎熬中艰难地生活，困苦的生活使他失去了少年时的勇敢、聪明、淳朴、真挚的性格，取而代之的是满脸皱纹和被封建制度束缚的麻木的灵魂。《药》中愚昧、麻木而善良的华老栓，一家人生活拮据，贫苦不堪，然而为了给儿子治病，却倾其所有，悲哀的是他儿子却成了革命先驱者的殉葬品。小说真实地反映了在闰土和华老栓所生活的那个特定历史环境中，个体的生活境况——物质上的贫困和精神上的愚昧、麻木。鲁迅自己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深切地感受到知识分子的处境，他们作为社会的先觉者和引导者，不仅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反而成为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在《孤独者》中被认为有鲁迅影子的魏连殳，作为一个时代的先觉者对社会现实有着清醒地认识不愿依附于它却又无力改变，然而为了生计又不得不依附这样的社会现实，最后在孤独中抑郁而亡。还有一类是深受封建社会科举毒害而又不能清醒认识自身处境的知识分子，在《孔己己》中深受封建社会毒害一生穷困潦倒的孔己己和《白光》中一连考了十六回而始终爬不上去的陈士成。这些知识分子不仅成为大家同情和怜悯的对象，而且也是需要被拯救的一群，需要一个平台让他们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和价值。同时也让我们看到，在这个社会里知识分子的危机和矛盾以及在精神和肉体上所遭受的苦痛。

时隔多年，以普通人自居的余华，曾在一个采访中说到：“至少我不是一个知识分子。”在他的生活经历中和底层人民有着密切的交往和联系。他在海盐文化馆工作时，整天下乡搞民间文化，经常接触的对象就是农民。他在讲述自己创作《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的人物形象塑造时，每次首先想到的都是底层人民，“夏天，南方，一个农民在耕地，满脸皱纹”^{[4]113}。“医院里靠卖血来维持生活的卖血者”^{[4]122}。余华带着对劳动人民特有的情怀，在文学创作的漫漫征途上跋涉。《活着》中的福贵本分地活着，小心翼翼，吃苦耐劳，唯一的目的是希望全家平平安安地生活下去，为此他情愿将所有的苦难都扛在自己身上，然而，命运却让他的家人相继离去。他并没有因为命运对他的不公而放弃生活，反而更加坚强的活着。《许三观卖血记》中的许三观虽是一个工厂的运茧工，但实质上他仍旧是农民的化身。面对艰难的生活他没有畏惧，他通过卖血娶妻生子，卖血造

就了全家人的幸福，让许三观完成了作为丈夫和父亲的来源，也成为他对抗苦难的唯一法宝。“余华最大的愿望就是想通过《活着》，写出了一位类似于中国老黑奴式的底层人物”^{[4]115}。他做到了。在余华塑造的这两个形象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底层人民的真实生存挣扎和对命运的坚忍，对苦难的宽容和承受力，他们也概括出了农民身上共有的精神特质。余华以自己的人生体验，关注着与鲁迅不同时代境遇中的知识分子的生存处境。《一九八六年》中的历史老师，由于在特殊的文革时代中遭受迫害，精神上无法承受文革给他带来的伤痛而变成疯子，以在众目睽睽之下自残得到精神上的慰安，来支撑活下去的信念。《两个人的历史》中的谭博，代表了作为那个时代新潮的知识分子被迫害被压制的生存境况。

其次，对妇女和儿童的关注。几千年的封建制度统治下的社会，妇女长期以来生活在男权社会中，不能主宰自己的命运，一直都处于被压迫的阶级。鲁迅深深地挖掘了她们在封建社会的“四大绳索”的束缚和摧残下精神的痛苦，写出了别压迫阶级的灵魂。在《祝福》中描写了一个底层劳动妇女祥林嫂“守寡—改嫁—再守寡”直到悲惨死去的苦难一生。祥林嫂是一个可怜而容易满足的女人，在辛勤劳动后就获得满足，也使她获得生活的信心，“口角边渐渐的有了笑影，脸也白胖了。”然而，由于她前后嫁了两次，丈夫都死去，她也被视为扫把星被剥夺了劳动的权利。在残酷的社会制度下，即便如此简单淳朴的基本渴求，也得不到，这种基本生存欲求的被剥夺，使她丧失了人的灵魂，失去了继续活下去的基本信念和欲望。在《明天》中的单四嫂子，在丈夫和儿子相继离开她时，她的精神支柱也轰然倒塌了，可怜无助对生活无望的她只能寄希望于明天。在余华的小说中塑造了只能忍辱负重被封建伦理道德束缚的妇女形象。《在细雨中呼喊》的孙光林的母亲，面对丈夫孙广才的背叛和欺凌，被伦理道德束缚的她没有反抗，只能忍辱负重，默默地挑起生活的重担。《活着》中的家珍丈夫福贵沉迷于妓院赌场，无视她的存在，最终败光家产回家时，她在很大程度上因为伦理道德的制约没有离开他，给他生活的信心和希望。在孙光林的母亲和家珍身上我们看到了中华民族劳动妇女宽容的美德以及所受的苦痛，她们缺乏反抗意识，缺乏主宰自己命运的意识，视苦痛为生活的常态，似乎是她们与生俱来就

必须要承受的。妇女问题在余华这里的演进,意味着妇女问题尚未得到彻底解决。

鲁迅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一文中,抨击父权,解放儿童,明确了做父亲的职责和义务“肩住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更广阔的地方”。又在《热风·随感录二十五》中呼吁“人之父”,这些深刻地反映了那个时代儿童的生存环境和状况以及鲁迅对儿童成长和教育的忧虑。进而在《狂人日记》中发出“救救孩子”的呼声,进一步表现了鲁迅对儿童成长的深切忧虑。《孤独者》中的大良和二良,在魏连受失业落寞时就冷落他而且拿出所谓的尊严,不接受他的食物,而当他发迹之时,又和他亲近,为了得到他们想要的,甘愿学狗叫,这样的状况怎能不为之忧虑。在余华的小说中儿童成长的话题被重新提及,他从起初有自己童年生活影子的《胆小如鼠》到《十八岁出门远行》中刚刚成年的孩子被父亲赶出家门,孤独地流浪,在生活中撞得头破血流,饱食人间疾苦的描写,标示着余华从单纯表现自我的层面上升到父亲道德缺失的层面。之后一系列以孩子成长为主题的小说,如《在细雨中呼喊》是以孙光林孤独心酸的成长的经历为主线,他是家里的多余人和累赘,他感受不到一丝父爱和家的温暖,最后在黑夜中发出绝望的“孤独无依无靠”的呼声。《现实一种》中由于父亲的袖手旁观而死于叔叔手中的皮皮。《世事如烟》中的算命先生为了自己的长寿,竟然残忍地用十一二岁的小女孩采阳补阴。这些是对父亲缺席的批判,何尝不是一堂“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的启蒙课,也是鲁迅“救救孩子”的呐喊声在现时代的回音。

在“呼吸着小百姓空气长大”的鲁迅和“不以知识分子”自居的余华作品中都对弱势群体中农民、知识分子和妇女、儿童生存状态给予了深切的关注,他们都把底层生存者热烈而朴素的爱。在余华和鲁迅的笔下,我们看到了作为时代精神的代言人的弱势群体在不同时代的生存方式和精神状态。

二

“五四”时期的中国,处于历史大变动大转折、新旧思潮激烈交战、东西方文化融会撞击的时期。因此这时期的启蒙,一方面是将输入的新思想与扫荡旧的观念相结合,批判旧制度,旧文化,试图建立“新人”“新文化”;另一方面,肩负起国

家富强、民族解放的重任。然而“五四”的启蒙是在“立人”的使命尚未完成时,便匆匆转向了“立国”。这种激进的方式预示这场战争必以失败而告终。但是启蒙战争的硝烟并没有因为“五四”的结束而消失殆尽,启蒙反而被作为一种知识分子精英文化理念,滞留于中国作家的文学实践中。在20世纪80年代“再启蒙”的文化语境中,启蒙的视域已经发生转换,即放弃“五四”时期国家富强、民族解放式的宏伟叙事,转而从讲述个体的生命故事出发,在生存的意义,进而接续着启蒙主义的文学传统。作为“五四”启蒙战争的“先驱”鲁迅,提出对国民性的批判,主要以立人为核心,进而反思历史。在20世纪80年代“再启蒙”的文化语境下,余华延传了鲁迅所开创的“五四”启蒙主义文学“国民性的批判”和“历史的反思”的基本主题。

首先,国民性的批判。“鲁迅对国民性的关注可以追溯到他弃医从文的动机,凡是愚弱的国民……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首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5]。他选择小说作为启蒙的投枪:“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必须是‘为人生’,而且是要改良这人生”^[6]。他的启蒙是以“立人”为核心,他致力于人的解放,关怀人的精神与主体性建设,探究隐藏在社会表象下的人性存在。在他的第一篇白话《狂人日记》中发出“救救孩子”的呐喊声中拉开了“启蒙”的帷幕,至此他的一生都在为启蒙事业而奋斗。《阿Q正传》中“阿Q是反省国民性弱点的一面镜子”,中国国民的劣根性在阿Q身上被淋漓尽致地描绘出来。无论是在《示众》中,通过看杀头的场面,描写了买馒头的“十一、二岁的胖孩子”,“赤膊的红鼻子胖大汉”、“挟洋伞的长子”的动作“看”,来批判看客们的麻木不仁。还是《故乡》中在贫困和封建制度重压下变得麻木的闰土,都有阿Q的一面。鲁迅无情地揭露和批判中国病态社会造就的病态人们身上的痼疾。鲁迅力图通过对生命个体存在的关注,一来使国民们自我反思、健全自我;二来激起他们的反抗、改造的欲望和决心。进而通过“立人”来达到“立国”的目的。

余华虽然没有发表过像鲁迅那样的“启蒙”宣言,但是他却在潜意识中践行“启蒙”的创作理

想,他把阿Q作为国民劣根性的参照系。余华对底层人民,一方面赞扬他们面对苦难时极大的忍耐力;另一方面批判他们的麻木和愚昧。《许三观卖血记》中的许三观,在妻子、儿子们面前,他是生活的强者,命运的战胜者,他们是他们一家的生活的支柱。而从“人”的角度来看,他和阿Q、闰土一样都是未觉醒者,面对苦难,他的本事就是忍耐,发扬自己的阿Q精神,甚至不惜自己的人格和尊严,陶醉在自我建构的生活世界中,在委曲求全地生活着。《活着》中的福贵,面对死去家人,他是幸运的,面对战争和土地改革他也是幸运的,他还活着,他的生命还得以幸存。然而在龙二等人合伙把他的钱财骗光以后,他不仅没有去讨回公道,夺回属于自己的家产,他却以一种消极的方式来对抗,他想以死来对抗和了结这一切。当儿子为他人的妻子献血丧命时,他没有把医院、老师、家属告上法庭,让他们受到应有的惩罚,而是自己把儿子背回家,偷偷地埋掉了。在命运的面前,福贵选择的是无言的顺从,沉默的接受。如此的忍辱负重,如此的麻木,这是美德吗?是社会没有赋予他反抗的权利还是自己弃权了,这是苟且偷生式的生存。在现实面前,许三观、福贵、阿Q、闰土等人是将自己在社会现实生活中缩小、消失,也即希望现实能够忽略他们的存在,是被麻痹了精神的一群,没有灵魂只有躯体。他们要的也仅仅只是生命肉体的活着。面对他们的苟活,是个体放弃了对主体性的追求,以此为代价换取生存的可能,从启蒙主义的视角来看,这是生活在黑暗中的一群,但他们不知道这就是黑暗,对他们身上的劣根性进行了无情的批判。鲁迅和余华都在试图用笔来唤醒他们被麻痹的神经,让他们从黑暗中走出来,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黄昏里的男孩》描写了一个水果摊主对一个偷苹果的小男孩的惩罚,尽管这个孩子多次说自己饿了,尽管他只是悄悄地拿了一只苹果。变态的水果摊主不仅让他吐出了唯一的一口苹果,无情地掰断了他的手指,还让他不断地喊自己是小偷,然而周围的看客却没有发出一声同情的呼救。鲁迅笔下的阿Q式的国民,在今天这个时代仍然存在着,看来启蒙主义使命并没有完成,余华是在延续着鲁迅“国民性的批判”的启蒙主题和使命。

其次,历史的反思。鲁迅在他第一篇白话文小说《狂人日记》中通过狂人之口道出“吃人”的历史,反思几千年来有着吃人历史的封建社会,从

此揭开了批判封建社会的序幕。《孔已己》中被封建社会科举制度毒害的孔已己,最后沦落为社会的边缘人物。《白光》中想借封建科举制度的扶梯爬上上层社会的陈士成,却始终都未得,最后疯癫落水而死。鲁迅从个体生存的角度出发,主要致力于封建文化的批判,即对封建社会从封建制度到文化深刻的批判。然而对于封建社会的批判和反思并不是为了憎恨,而是希冀通过对历史的反思来取得进步,来构建一个新的民族国家。新时期的历史的反思,主要是借政治进行历史反思和批判,表现在对政治苦难的挖掘,把个体身心遭遇与时代的苦难纠结在一起,政治苦难成为作家反思历史的突破口。余华带着童年对文革的记忆,在他的作品《一九八六年》中,塑造了一个研究古代刑罚的教师,在文革中深受刑罚之苦,多年后他以疯子的形象重返故乡,以自残开重演“文革”的历史。历史老师的自残行为,既是对“文革”那段历史场景的再现也是他“文革”记忆的延续,即“文革”时期政治上所犯的的错误对知识分子残无人道的迫害。《两个人的历史》是一种历史的两种结果。少爷谭博和女佣兰花年龄相仿,由于各自的生长环境不同,有着不同的梦,生活道路也截然不同,谭博投身于革命,希望通过革命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然而因为谭博的少爷身份与革命内部对地主子女的排斥,使他成为革命者的理想落空,从而注定了他的悲剧命运。谭博的悲剧是历史的悲剧,是那个时代和历史环境给成的,即在历史上极左思想掌控革命时期对地主子女的敌视态度。谭博被革命时期的政治观念和权利话语排斥和压制,忘却和遮蔽。历史带给他伤痛的记忆。通过历史老师和谭博的个体身心遭遇对历史进行强烈的控诉。在余华的作品中我们看到“五四”由鲁迅开创的启蒙主义文学传统并未在八十年代中断,也看到了生命个体在这里得到极大的重视,从“启蒙主义允诺的理想社会,最终必须建构在每一个孤单的个体的幸福之上”^[7]来说,标志着启蒙主义在八十年代余华小说中的成熟。

鲁迅因子在余华小说中的体现不仅让我们看到了“鲁迅存在的伟大意义”,也看到了鲁迅在当代中国的意义。虽然余华不及鲁迅深刻,但是他却在积极地向鲁迅靠拢,和鲁迅一样用自己的精神和灵魂去构建一个更加真实的精神世界,留下时代的痕迹。

(下转第52页)

[4] 燕燕. 姨妈的后现代生活[M]. 北京: 昆仑出版社, 2006: 340.

Losing of Spirit and Regression of Reality —On the Adaptation of *Postmodern Life of Aunt's*

AN Jing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Abstract: There are a lot of common "illnesses" in the film reorganization at present. Sometimes it dispels some kind of spirit for entertainment and the marketplace. Meanwhile, the film is also able to weaken some unreasonable circumstances in the fiction, making them much better return reality. The adapting of *Postmodern life of aunt's* mainly shows "losing of spirit" and "regression of reality". But a real playwright ought to succeed in escaping script and time's invading successfully with some special way in order to gain some eternity.

Keywords: postmodernism; losing of spirit; regression of reality

(责任编辑: 李开玲; 校对: 沈爱琴, 丁小玲)

(上接第 38 页)

参考文献:

- [1] 徐林正. 先锋余华[M]. 杭州: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03.
- [2] 何凝. 鲁迅杂感选集序言[M] //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鲁迅研究室. 1913 - 1983 鲁迅研究学术著作资料汇编.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1985: 820.
- [3] 鲁迅. 集外集拾遗·英译本《短篇小说选集》自序[M] // 《鲁迅全集》第 7 卷.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 411.
- [4] 洪治纲. 余华评传[M]. 郑州大学出版社, 2004: 113.
- [5] 鲁迅. 呐喊·自序[M] // 《鲁迅全集》第 1 卷.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 439.
- [6] 鲁迅. 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M] // 《鲁迅全集》第 4 卷.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 526.
- [7] 叶立文. 颠覆历史理性——余华小说的启蒙叙事[J]. 小说评论, 2000(4): 40 - 45.

Lu Xun Factor in Yu Hua's Novels

WANG Ji-peng, JI Rui

(Graduate School, Liaoning Normal University, Liaoning Dalian 116029, China)

Abstract: Yu Hua has been thought to be the last one inheriting Lu Xun's writing style. From the novels by Yu Hua, the paper has searched for Lu Xun factor and explored Yuhua in the cultural and creative spirit of Lu Xun's on the succession. Yu Hua in the vulnerable groups of peasants, intellectuals, women, children, the survival of the state of great concern, in the "critical national character" and "reflect on history," the two enlightening literature on the subject, can be embodied in the Lu Xun the spirit of the inheritance.

Keywords: Yu Hua; Lu xun; factor; enlightenment

(责任编辑: 李开玲; 校对: 沈爱琴, 丁小玲)